也论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责任

朱金甫

Weng Tonghe, as the emperor's tutor and key minister strongly advocated 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war—time policy—making in the Qing court. After its defeat, the Qing court suffered the unprecedented humiliation and hardship of losing troops, paying indemnities, and ceding territory, Weng was censured then for "advocating war and harming the country" and many historians today still reproach him for his pro—war stance. This writer believes that at a time when China faced Japanese aggression, Weng's advocacy of a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rough war was a correct political choice arising out of motives of loyalty to the throne and patriotism. It represented the just voi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nd as such should not be condemned. Considering the balanc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orces at the time, the outcome was not inevitable. Chinese defeat was due only to the corruption of the Qing court and opposition to the war by the pro—peace faction led by Li Hongzhang who, though in charge of the war effort, sued for peace and gave up the initiative on the battlefield.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结果是中国的清政府失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丧师、赔款、失地,灾难深重,耻辱空前。举国上下莫不气愤捶胸,痛心疾首。以致对此战争失败的责任,严加追究,责难纷纭。其中对翁同和这位主战重臣,不仅当时朝议臧否各异,而且至今在史学界仍是看法不一。本文拟就此稍作评述。

一

翁同和(1830—1904),字叔平,江苏常熟人。1894 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起交涉之时,翁同和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受命参加会商交涉事宜。是年 10 月,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之后,他受命为军机大臣,正式成为清廷中枢机构的成员,参予了战事的决策,经历了整个战争的过程。由于他长期以来是光绪帝的儒学师傅,与光绪帝的关系密切,有着其他大臣所不具有的陈情进言的机会,光绪帝对他也十分信任。故《清史稿·翁同和传》有:“同和善伺上意,得遇事进

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之记载(1)。翁同和自己也说在甲午战时“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2)他不仅对光绪帝深有影响，而且由于常熟翁氏一门显贵，父、兄及其侄不是官居极品，就是封疆省区，或是清华鼎甲。翁同和本人更是屡次典乡试、点学政、充会试总裁，朝廷上下，门生故旧甚多。所以翁同和在晚清官场中，应该是颇有势力和影响，尤为当时清流朝臣所向往。其所以能引起人们对其在甲午中日战争所起作用及所负责任的种种猜测和议论，这是决非偶然的。

翁同和在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政治态度，《清史稿·翁同和传》上明确记载：“时，日韩启衅，同和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翁文恭日记》上更详细地记载了翁同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坚决主战的思想和言行。因此对翁同和是主战派这一问题上，无论在晚清当时还是在现在，论者均无异议。问题是在翁同和的主战立场，对甲午战争时期清廷中枢和战的决策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以及翁同和的主战立场对当时的国家利益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据说在甲午战争中力主和议的恭亲王奕䜣后来在病危时，曾对光绪帝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数十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赔款。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3)奕䜣在这里所指责的大司农就是翁同和，因为翁当时的实职是户部尚书。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内也以“名流误国”为题，说：“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同和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常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及东事起，咸起言兵。……上为所动，兵祸遂开”(4)。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也记有：“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和）也。此事通国皆知，无可为讳。合肥（李鸿章）力言不可开衅，大为盈廷所诃。比战时，日本合全国之力相向，而吾国以叶志超乳臭小儿游戏当之，遂至一败涂地”(5)。这些记载的共同要点是两点：第一，翁同和对清廷决定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的决策中起了主要作用；第二，翁同和的主战立场给国家带来了灾难。关于这一点，笔者虽然认为，根据《翁文恭日记》及其他史料所载可知，翁同和的地位及其主战立场，无疑对清廷的决策有着比较大的影响，然而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在最初也并非坚决主和，而光绪帝的主战态度则更比翁同和还坚定，所以要把开战的责任完全推给翁同和，这不但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那些反对翁同和主战立场的人看来，甲午之时，清廷根本无力与日本相对抗，主战必败，败则误国，唯有屈辱求和，才是顾全国家的根本利益。当时奕䜣是这么看，李鸿章是如是说，现今亦有人认为：“如果说翁同和和李鸿章都是人才的话，中国还是更需要李鸿章这样敢于负责、敢拼却个人声名而保全国家的人”。事实果然是如此吗？翁同和真的不应该主战吗？这首先要从这场战争的起因及战争的性质方面去认识。众所周知，日本早在明治之初，就有了侵占朝鲜的野心，提出了“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的侵略计划(6)。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特殊藩属关系，严重影响了日本侵略野心的实现，日本便将中国视作其夺取“利益线”的障碍，决心伺机与中国一战，以便侵占朝鲜，进而强占台湾、澎湖，夺取黄海、渤海和东海等广大海域的制海权，称霸东亚。1894 年 2 月，朝鲜发生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向清廷求援，李鸿章奏派叶志超率兵赴援，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通知了日本政府。日本认为入侵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亦立即派兵赴朝，并决心乘机对清开战。当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部的方针十分明确，就是要“以兵力威吓朝鲜国政府，并驱逐清国军队于朝鲜国外”，否则他们担心“政府所希

望获得之利权亦殆近于不可能者”(7)。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说得更露骨，他说：“索性使两国(中、日)关系破裂，余自始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注意……余假此好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关系，乃欲因此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8)。因此，早在是年7月7日，当清廷对日军在朝鲜进驻重兵并向在朝清军一再挑衅的行为，尚在难以决定对策之时，日本大本营即已制定了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的战争计划。当时日本驻美公使亦于是日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9)。所以到了7月中旬，日军已作好一切对清开战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方虽然仍一味退让，毫无对抗之举，但也并未能换来和平。日军眼见挑衅不成，即于7月23日，对清不宣而战，派兵占领了朝鲜王宫，并向驻朝清军发动进攻。7月25日，日军海军舰队击沉了运送清兵的高升号，700多名清军官兵遇难牺牲。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向朝鲜成欢的中国驻军展开了攻击。7月29日，成欢被日军攻占，清军溃退。8月1日，日本正式对华宣战，清廷被迫亦对日宣战。

由以上可知，中日甲午战争之爆发，绝非当时清廷光绪帝或翁同和等大臣主战的结果，乃是日军经过长期准备、蓄意进行侵略朝鲜与中国之所致。日本对清廷的不宣而战，说明无论清方是主战或是主和。这场战争已是无可避免。清方的对日宣战，乃是在日本从不宣而战到正式宣战的无可奈何的反应。日本是这场战争的挑起者，清廷是被迫的抵抗。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对清廷来说，乃是一场保护自己利益、保卫自己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在大敌当前，并且敌方已经发动了进攻的情况下，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战求和。翁同和等人的主战，完全是一种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和行为，是代表了当时国家及民族的利益、也是反映了当时朝野舆论要求的正确选择，他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至于翁同和等人的主战立场是否属于盲目固执，中日军力相比是否清军必败，这也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综观中日甲午战前中日双方之军力对比，无论陆军与海军，清方均非必败之局面。事实上，日本军方尽管野心勃勃，一心想称霸东亚，但对此次甲午之战，也是作了万一失败的准备，并无必胜的把握。当时从陆军而言，清方总兵力约一百万挂零，如果去掉其中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八旗兵及绿营兵，单计各种防军与练勇，则有三十六万余人(10)。这些军队早自同治年间，就开始西法训练，并且陆续装备了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其中淮军的步兵主要配备美国的亨利马梯尼后门枪、德国毛瑟枪等，炮队则大多装备了德国克虏伯大小后门钢炮，马队多用十三响快枪。并且清政府也已在江南、武汉、山东等地开办了兵工厂及军需厂，仿造枪炮及生产弹药。虽然生产能力有限，军队新式装备也未能普及，但毕竟已与过去的旧式训练和以冷兵器为主的旧装备不同，只要军纪严明、指挥得法、攻守有术，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日本军队虽然在训练与装备上比清军优良，他们国内军工生产依靠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也较快，无论枪炮弹药以及各项军需品的供应，基本上已能自给，而且储备量非常充足，其自产的炮位和炮弹之质量有些已超过了德国。因此日本陆军装备的普及性及优良程度，均比清军为高。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的兵力共有六个师团及一个近卫师团，各师团虽然步、骑、炮、工兵等各兵种相当齐全，但总兵力只有七万五千多人(11)，比之清军，人数相差较大。虽然在战时日军可以随时扩充，但毕竟是远离本土，后援条件受到限制，因此就陆军的整体而言，日军很难说一定会打败清军。

再就海军而言，这次甲午战争，日军是渡海进攻，因此能否取得制海权，保证陆军的抢攻登陆及后续部队与装备的源源不断，就成为此次参战日军至关紧要的生命线。出于夺取制海权从

而称霸东亚的需要，日本政府及其军部很早就开始重视建设和发展海军，尤其是重视针对中国海军的海军建设。早在1882年，日本就将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提出八年造舰计划，决定每年投资330万日元，到1890年建造大小舰船48艘(12)。1886年，在得知中国三洋海军已粗具规模后，又修改八年计划为三年造舰计划，准备到1890年建造大小舰船54艘。1891年，又提出九年内造11000吨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的计划。经过如此二十年的具有野心的经营之后，到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中等以上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排水量达到59000多吨。尤其是日本曾详细研究了中国海军，认为中国海军中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定远"与"镇远"号，是日本海军的最大威胁，便紧急筹措资金，于1891年建成了"松岛"、"桥立"及"平岛"三艘4000吨级的主力铁甲舰，并在机动性、进攻性方面作了很大改进，又普遍地在其主力舰上安装了速射炮150多门，还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13)。因此，日本海军对清方海军具有很大的威胁，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清方在经过三十年来的建设之后，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到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78艘军舰(不包括其他武装船只)、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为8万余吨(14)，显然在规模上要大于日本海军。当时西方评论家曾将中国海军列为世界海军第8位，日本海军第16位。(15)。不仅如此，清方在建设海军的军费投入上、官兵训练的时间上，以及基地设施之齐全方面，也都超过了日本海军(16)。因此尽管日本海军在装备的优良及舰只的性能方面较清方海军稍优，但按总的实力来看，清方海军是可以与日本海军一博，并非是必败无疑的。

根据双方军力的对比，更主要的是清方陆军除在朝鲜战场外，都是在本土作战，清海军也是在近海作战，是属于保卫祖国领土、领海的正义战争，有广大的人民和后方。海军更有旅顺、威海、大连三大基地可依托，这三大基地都具有完整的舰队。尤其是旅顺港，被当时人称为"远东第一大名港"，远非日本横须贺、佐世保等军港所可比(17)。所以，认为甲午战争时中日不可战，战而必败，主战就是误国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何况连日本的史学家有的也认为，只要清廷"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18)。

二

至于有人认为翁同和主战的动机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罔顾国家利益的问题，笔者认为，评论人物是非，似应从其人一贯之作为而作全面的判断，不宜仅据一时一事而轻易定论，主观的揣测罗织则更是为严肃学者所不取。纵观翁同和宦海浮沉近四十年之经历，证明其凡逢国政大事，他不仅从来都是立场明确，而且总是持较为理智的态度，不像是个投机侥幸之小人。这在翁同和自己的日记中固然记载甚明，而且还可从《清史稿·翁同和传》所载翁同和一生史实中获得证明。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遇灾时，他疏奏："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致使同治帝览奏而动容。在同治帝执意要为慈禧重修圆明园时，廷臣力谏，同治帝心中为此不悦，而翁同和又"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园工遂定。光绪六年(1880)，清廷为修改伊犁条约而派曾纪泽赴俄力争，翁同和受命参决其事，力主改约，直至条约改定而止。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前，翁同和此时已是军机大臣，他主张"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应有所备"，并主张"非增重兵出关不可"(19)。这些都说明翁同和在对待国家重大事件方面一贯所持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理智的态度。即以甲午战争中翁同和的表现而言，他虽力主抗战，但也决非盲目冲动。当朝鲜请兵入援之初，光绪帝

及翁同和等就意识到了事态的复杂性。随后日军借口护侨而加紧向朝鲜增兵并拒绝与中国同时撤兵，益使他们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当时俄英等国都表示要出面调停，李鸿章等主和派大臣都对此寄予极大希望，不肯积极备战，翁同和对此虽然并不反对，但亦不抱不切实际的希望。他认为在大敌当前、战云密布之际，首先要有战争的准备，主要应靠自己的力量。力主“俄不能阻，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20)。以后的事实证明，翁同和的看法和主张是正确的。同是侵略者，外国不可靠，以夷制夷只是李鸿章等人的一厢情愿而已。然而翁之主战又与另一些主战派的过激言论和主张有所不同，当时有人上折奏请“明宣战事、规取东京”；有人陈奏乘机灭亡日本(21)；也有人建议以江南水军直捣日本长崎，以闽水军直捣日本横滨等(22)。翁认为这些言论虽“语殊豪纵”(23)，但不切实际，并不支持。在日军尚未向驻朝清军发动进攻之前，他并不主张立即对日开战，而是主张采取“不战而屈人之术”，一面速筹战事，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一面稍留余地，只要日本稍有和意，就双方谈判协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他甚至对当时英国公使所谓将联合五国勒令日本自朝鲜撤军之言，认为是：“其言确凿可信”(24)。可见翁同和之主张乃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战议和，而不是去消灭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当时一些主战派人士对翁的态度也不尽满意，甚至有人对他责备颇多。翁本人也深知“此时清议大约责我不能博采群言，一扫时局；然非我所能及也”(25)。事实也是如此，翁同和虽深得光绪帝之信任并已入为军机大臣及兼任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参予甲午之战的战略决策，然而他手中并无实权，内受军机处及督办军务处首脑之压制，外被李鸿章等人之抵制，除了陈言及力争之外，于和战大局确非其所能决定者，只能悲叹“然非我所能及也”。翁同和在此困境之下，作为实职的户部尚书，除了脚踏实地努力为战局筹款备饷之外，并不考虑个人得失，甚至不怕冒犯当时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及得罪主和之高官显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为此他与慈禧的宠臣荣禄彼此争论、互不相让，“几无日不因公事争执”，(26)他与复出不久的恭亲王亦意见相左。甚至当慈禧派他去天津代表朝廷与李鸿章商量设法请俄国出面调停一事时，他也当面拒绝前往，并且不惜犯颜直谏：“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赏，将何以畀之？且臣于此等始未与闻，乞别遣”(27)。最后慈禧作了让步，让他去宣旨切责李鸿章贻误战守，问李鸿章“此后作何收束”，翁才被迫同意前往，并声明李鸿章作何答复，他可以回京客观转达，但他本人不加论断。此后翁同和拒绝参加和议的商讨，对于马关条约之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他更是坚决反对，在万无可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表示宁可赔款也不能割土，并且为此而努力奔走筹款。翁同和作为主战派在朝廷中枢的代表人物，如此敢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正说明了他个人一贯不计及个人名位而忠君爱国的立场和正直的品德。荣禄骂他为“伪君子”，这是出于政见之不同，故而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现今仍持与荣禄相近的看法，似乎就未免稍嫌不公平了。

甲午战争的惨败，导致最终割地赔款，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的欺凌耻辱，对翁同和的刺激很大。在讨论马关条约应否批准期间，他“战栗哽咽”，时感“闷极、急极”，时喊“如何、如何！”不是在御书房与光绪帝“君臣相顾挥涕”，就是与友朋“相对欷歔”，以“不能碎首以报”为憾。他深知“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则日夕在念，思所以维持之，卒不能得”，因此“叹息抑郁瘀伤成疾矣！”在决定换约那天，翁同和难过得不能进食，写下了“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矣”的日记(28)。也正因为如此，甲午战争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甲午战前他是一位思想相当保守的大臣，到了甲午战争后期，他开始接触了一些有关西洋的书籍。如 1895 年 2 月初 2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穷日之力看普法战纪四本，疲极矣”(29)。甲午战后，他逐渐产

生了思改法以图强的想法，所以他后来开始接近维新人士，并向光绪帝推荐了康有为。以致最终被开缺回籍，并在戊戌政变之后被慈禧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因此从甲午战后翁同和之思想言行，也可再次证明他是一位具有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一贯坚持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的晚清时期并不多见的大臣。

三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其时廷臣多有指责翁同和主战误国者，其后史学家持此论者亦不乏其人。其实这种指责，大有本末颠倒之嫌。因为史家十分清楚，清方之所以会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主战，而是在于战而不力。

客观地说，在朝鲜求援之时，清廷如果不轻易出兵，而采取其他决断措施，则日本纵然有侵略和称霸的野心，但因无出兵朝鲜的借口，中日之间的战争或可稍延时日，而且即使日本单独出兵朝鲜，也不致很快就将战火延烧至中国领土。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出兵朝鲜一事上，清廷当局，包括慈禧、光绪帝及枢臣、不论后来是主战或是主和，当时却并无二致，尤其是李鸿章，当时他是完全同意"遣兵代剿"，并且他迅即派叶志超率部前往，而后来被人指责为主战误国的翁同和，当时尚无参予中枢决策的资格。本文前已有述，甲午战争是以出兵朝鲜为关键，因为日本早就完成了针对中国的备战，正在寻找与中国开战的借口。朝鲜事起，被日本认为这是挑起中日战端之良机，就怕中国不肯出兵朝鲜，所以日本早就通过各种渠道鼓励中国出兵援朝，李鸿章等果然堕其奸计。自此日本就紧抓这个机会不放，清兵 1500 名刚到朝境，日军 700 名也迅即抵达。所以，只要清廷派兵入朝，日本启衅就有了可能，不管清廷后来是主战还是主和，中日战争已是难以避免，即使清廷决定单独撤兵，日本也决不会听任清军平安撤离。在清军既已进入朝鲜，日本已经抓住不放，并且乘机大量增派重兵入朝的情况下，光绪帝及翁同和等眼见战争已难避免，形势非常危急，遂三次谕令李鸿章妥筹战守。但李鸿章拥兵自重，惟恐有损自己实力，一意主和，并且在主和派大臣的支持下，大做其以夷制夷的美梦，想依靠俄国的干预而制止日本的战争意图。因此他对光绪帝的主战谕旨虽表面敷衍，实则寻找借口进行拖延。在日本已大军压境之下，他仍要求驻朝清军"静守勿动"，采取不战、不和、不撤的消极方针。他甚至还相信日本会遵守国际公法，不会先行动手。后来在谕旨及舆论的压力下，虽然增派了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及丰升阿等四路清军入朝增援，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余人，云集平壤。而此时日军兵力尚未集中，清军如能抓住战机，长驱南下，占领战略要地、控制朝鲜全境，给日军以迎头打击，则战局尚有可为。但入朝清军仍执行李鸿章的消极避战方针，不思进取、株守待打。光绪帝虽严谕李鸿章饬在朝清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而李鸿章则始终以兵力不敷为藉口，拒不受命，失去先机，以致日军精锐一万六千余人终于在朝集结，完成了战略展开，实现了对驻朝清军的包围，并且不宣而战，首先发动了对清军的攻击。清军先在成欢被击败，继而在平壤溃散，总兵左宝贵牺牲，朝鲜丢失，战火很快烧到中国的本土。

在主和派掌握下的陆军命运是如此，海军的情况则更令人扼腕。李鸿章一向视北洋海军为自己的资本，害怕在战争中遭受损失。他从北洋海军建设之初，就以消极防御为其建军的指导思想，他把海军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欲使之起不战而屈人之目的，而根本就没有在海上实战中使用北洋海军的思想准备。甲午战前，光绪帝曾多次查询北洋防务及舰船的情况，战争开始以后，又谕令李鸿章对海军运筹熟计、控制海面、陆海协同、确保京畿门户，打赢这场战争。但李鸿

章坚持消极避战的方针，拒不采取任何积极备战措施。甲午战争中，日本军部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进而与清军在陆上作战，最终打败中国，所以日本的联合舰队一心要寻歼北洋舰队。对此，李鸿章不是针锋相对，设法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海上决战，以掌握制海权，而是畏敌避战，消极保船。结果海上先机也为日军所掌握，清军处处被动。当驻朝清军受到日军严重威胁时，北洋海军官兵曾要求出动舰只，控制海域，先发制敌。但这不仅被李鸿章斥之为"不自量力"，不准出动，而且他还命令驻朝舰只全部撤退回国，放弃了与旅顺、威海互为犄角的朝鲜仁川港以避免与日舰冲突，这实际上是弃援朝清陆军于不顾。接着就发生了丰岛海战，清方失利，所租高升号运兵船被击沉，其上所运之援朝陆军壮烈牺牲。此时李鸿章更下令北洋舰队必须持重防守，决不许滥进袭击日本舰队。并限令北洋舰队只能在山东成山角至鸭绿江口一隅活动，不准巡海制敌，从而主动放弃了黄海东域和朝鲜海峡的制海权。这不仅使朝鲜战场上清军失去海上支援和配合，而且使北洋海军在缺乏与敌决战的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及周密的作战预案下，发生了黄海大战，北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邓世昌等海军将领英勇牺牲，黄海制海权全部丧失。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重大，但并未因此而完全失去作战能力。当日军在海军护送下于辽东半岛登陆时，光绪帝令丁汝昌率舰断其后路接济，却又被李鸿章推托为"力固不能"，北洋海军终于未敢出动。旅顺口危急时，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曾亲到天津请示出动全舰队奋力救援，李鸿章仍是不准，要丁汝昌："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30)，旅顺海军基地遂落敌手。李鸿章也更成了惊弓之鸟，为了保船，他更严令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31)。自此北洋舰队，缩在唯一基地威海之内，进一步放弃了渤海及近海海湾的制海权，使日军毫无顾忌地登陆荣成，从侧面进攻威海，很快使北洋舰队陷入水陆重围，坐以待毙，终于全军覆没。

综观以上，可见在主和派的消极求和方针下，即使清军作战能力很强，而在处处被动挨打的处境下，亦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更何况当时清军之腐败亦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并且这也成了甲午之战中清方惨败的另一重大原因，实际上这是根本的原因。清军之腐败，源于整个清王朝的腐败。早在甲午战前，清廷上下就已是浑浑噩噩，很少有人以国家为重，更很少有人关心和研究世界敌我形势。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爵禄地位，所追求的是如何享乐挥霍。为此而在政治上瞒上欺下、尔虞我诈；在经济上则贪污受贿、敲榨勒索，社会一片黑暗。就以慈禧太后而言，这个没有多少文化水平但权欲极重的老妇人，对国家前途、世界形势虽然昏然无知，却无时无刻不在玩弄权术和挥霍享乐。因此在甲午战前她既未认清形势、筹备战守，而且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她心中所想的大事，也只是如何防备光绪帝夺走她手中的权力，以及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她六十大寿的庆典。尽管当时前线军情吃紧，她仍在大搞庆典点景工程，挥霍巨额本来应该用在国防战备方面的财力和物力。当日军已经侵入中国领土，金州失守之电报到达清廷，其时慈禧正在听戏，枢臣都不敢立即入报。而在她之下并且深得她宠信的掌握国家政权和兵权的大臣和将帅，除了把权位及所属军队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资本外，就只知如何去取悦于太后主子。平时既不去认真训练军队，战时更贪生怕死。因此当时的清军虽然为数在百万以上，但大都是虚糜饷银，没有多少实际作战的能力。即以平壤战役而言，当时清方参战军力为一万五千左右，日军为一万六千左右，双方相差无几。清军纵然无力进攻歼敌，至少在朝鲜军民的支持下，固守待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清军却遭受重大伤亡、溃不成军，其原因除战役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及装备方面的差距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清军纪律败坏和将领的怕死无能。清军入朝的目的本来是支援性质，深受朝鲜群众所欢迎。谁知这些清军大多纪律败坏，

如卫汝贵部入朝之后“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盛军所至，奸淫抢掠，无所不至”，以致最终“韩民怨谤实深”(32)，失去了朝鲜人民的支持。那些率兵入朝的清军将领，虽然也有像左宝贵那样为国牺牲的勇士，但大多数却是贪生怕死之徒。平日他们克扣军饷、贪污自肥，使士兵“但能养命，不能果腹，人人伤心解体，积怨成仇”；临战之时，主帅叶志超首先张皇失措，不能认真布防以固守待援，反而请求开缺回天津养病，自乱军心。平壤攻防战刚刚开始，叶就自行退守，慌乱溃逃，以致引起全军的混乱，军溃城失。所以可说平壤之败，非败于战，而败于主帅的怯懦溃逃。其实岂止叶志超一人而已，其他统兵将领，大都也是统兵无能而逃跑有方之辈。不仅朝鲜战役如此，此后的辽东地区保卫战、金旅战役、山东半岛战役等，亦莫不是由于清军将领贪生怕死及清军士兵的无心作战而一触即溃。虽然也有像宋庆、聂士成等极少数将领尚能一战，但杯水车薪，难以左右整个战局形势。

北洋海军的素质虽比陆军稍好，但同样也有指挥官腐化无能、贪生怕死及士兵纪律松弛、作战无力的问题。以黄海海战为例，其役双方参战实力相差无几，北洋海军参战兵力共有舰艇34艘，排水量为4.36万吨；日本联合舰队29艘舰艇参战，总排水量约为5.2万吨。中、日参战舰艇总排水吨数之比为8:10，中、日双方舰炮门数之比约为7:10，清方稍逊。但北洋舰队的大口径炮与日舰相比却占将近2:1的优势，双方鱼雷发射管数则基本相当，舰艇航速也基本持平。北洋舰队还拥有依托本国沿海基地及受到岸防阵地支援的有利条件，而日方则远离本土，后方支援困难。然而北洋海军在此役中却遭到惨败，其原因当然很多，腐败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表现在平时训练的松弛、弄虚作假，虚行故事，严重地影响了舰只的战斗力，以致在黄海大战中，连迎敌的战斗编队都无法完成，火炮及鱼雷的射击，在五小时的海战中竟未能击沉一艘敌舰。而海军管理衙门的腐败则更令人吃惊，从该衙门的总办、帮办到章京，几乎全是八旗子弟，他们根本不懂海军建设，只知利用海军去升官发财。因此晚清南北洋海军的舰船不是常年处在训练及巡航之中，而是被用来送货接客，赚取银两。并且接受外国军火商的贿赂，购买劣质枪炮弹药而根本不考虑其严重后果。而且所购枪炮子弹以及机器的零配件，缺乏相对的统一标准，以致舰艇“所领子药，多不合式”，临敌无法应用。因零件损失不能更换而停放的枪炮更是不少。他们办事敷衍、管理效率低下，黄海战时，北洋主力舰定远、镇远两舰主炮榴弹只有三发。此事早在两年前李鸿章就令增加库存量，结果始终拖而未办，以致临战无法发挥主炮作用(33)。又如致远、靖远两舰之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也始终未能修复，以致在此次战争中中炮后迅即沉没。北洋海军的腐败还表现在主官无能、将帅不和、官兵矛盾及军纪不严等方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本身就不懂海战，为其部下所不服，因而“威令不行”，临敌不听指挥。丁汝昌还在刘公岛起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各将领也大都克扣军饷、贪污公款，违犯军纪、携眷构屋、嫖娼聚赌而无人过问。他们根本不与士卒共甘苦，而士卒也就不与军官共患难，彼此之间“嫌隙甚深”(34)。这种松懈的军纪及腐败作风之弊端，一到临敌作战就暴露无遗，在黄海海战，不仅有将领临敌脱逃，而且有的士兵也不肯执行作战命令，故意置命令于不顾。甚至直到北洋舰队在威海陷入日军海陆军重重包围之中，“来远”与“威远”两舰已被日军击沉之时，该两舰管带竟还在岸上妓院未归。

由此可见，临敌作战，装备武器固然重要，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腐败了的军队手中也无法发挥作用。翁同和等主战派他们之所以坚持主战，首先是出于爱国的正义立场，同时他们也从当时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方面来考虑，认为己方还是可以一战的。以战谈和比之不战求和，无论如何总是上上之策，奈何他们绝没有想到，李鸿章等统帅下的清军陆海两军，在战场上的表现

竟是如此毫无战斗能力。所以甲午战争清方之败，决不是主战派或翁同和的主战误国，而是孙毓汶、李鸿章等主和误国，是清廷及清军的腐败而致败。正如当时吏部候补主事鲍心增等所言："李鸿章父子之主和，必曰不能战、不能守，势处无可如何也。不知自牙山以来，多败于不战，非败于战也"(35)。

---

(1)《清史稿·翁同和传》卷 436；
(2)《翁文恭日记》，甲午十月初八日；
(3)《申报》1888 年 6 月 27 日，见《戊戌变法丛刊》三，第 381、382 页；
(4)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1"名流误国"；
(5)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第 111 页；
(6)(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军队和军部)》第 124 页；
(7)(日)山崎有信：《大鸟圭介传》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第 119 页；
(8)(日)陆奥宗光：《蹇蹇录》第 21 页；
(9)(日)田保桥洁：《日清外交史》；
(10)此数字主要依据川崎三郎之《日清战争》一书之统计；
(11)据松下芳男：《日清战争前后》及川崎三郎《日清战争》之统计数字。
(12)(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13)据丁海涛、黄荣泉：《中日甲午战争中两国海军战略比较》，载《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14)日本《海军省明治二十五年报告》第 66 页；
(15)《万国公报》第 88，林乐知：《各国新政治记》；
(16)(18)皮明勇：《甲午海战与晚清海军管理》，载《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17)(日)大久平治郎：《光绪帝》，明治三十五年十月东京横山会社出版；
(19)以上均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三，翁同和传》；
(20)《翁文恭日记》甲午七月十六日；
(21)(23)同上书，甲午六月十八日及六月十九日；
(22)曾廉：《瓤庵集·代人上恭亲王笺》；
(24)(25)《翁文恭日记》甲午六月二十五日，甲午七月二十日；
(26)荣禄致鹿传霖便条，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五·中日战争》第 4 册第 576 页；
(27)《翁文恭日记》甲午，八月二十八日；
(28)以上均见《翁文恭日记》，乙未三月三十日、四月初四日、四月初八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四日；
(29)同上书，乙未二月初二日；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五·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67 页；
(3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9；
(32)以上均转引自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陆战史》；
(33)《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材料汇编下册第 398—399 页；
(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五·中日战争》第 6 册；
(35)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吏部候补主事鲍心增等条陈李经方罪状呈文》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五·中日战争》第 4 册第 120 页。